

文化传承视域下的“四库学”建设

【编者按】《四库全书》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也蕴含着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随着《四库全书》研究的进展,“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区域文化学”等概念相继提出,“四库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近年来,“四库学”研究中心、“四库”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四库学研究集刊》的持续出版,“四库”申遗的提出与实践,将“四库学”研究推向热潮。本组文章在文化传承视域下反思“四库学”的建设,意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发展背景下,推动《四库全书》研究在保存、总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民族价值取向和民族学术个性,构建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方面的价值。

关于《四库全书》与“四库学”建设的若干思考*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四库全书》以其基本上囊括中国 18 世纪及以前要籍,记忆中国 18 世纪及以前文化,传承之功莫大焉。对它的研究,自其成书以来,就先后相继,成果丰盛,成就斐然。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因台湾地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则有“四库学”概念的提出及共识。至今,因内容、范围等的扩展,“四库学”的内涵与外延得以增益,遂有以《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倡议及实践。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对《四库全书》的系统研究,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本文拟就此谈几点拙见。

一、四库承载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四库”之名源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开元时,皇家藏书以甲乙丙丁为序,依次将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凡四部库书,长安、洛阳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①“四库”于是得名。由此可见,“四库”既传承了天干前四位甲乙丙丁之朴素的类序观念,又坐拥经史子集四部所有书籍。可以说,“四库”是以经史子集为序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及其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的代称。而我们通常认为的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古代图书分类名称,^②是近代之后词义发生转移的结果。亦即,“四库”既容括了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也承载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是内容与形式的合二为一,且与生具有文化传承功能。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9ZD22)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旧唐书》卷 47《经籍志》,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2082 页。

② 中国古代有图书分类法之实,无图书分类法之名。各种图书分类法,近代才出现专名。

“四库”的名称虽然出现在唐玄宗时期,但是,若追溯它的渊源,则可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以六部著录群书之时。正是刘向、刘歆父子二人以六部归类书籍,为中国书籍分类开辟先河,才有了日后在六部基础上的四部分类。而到东晋李充仍以西晋荀勖甲乙丙丁为名,但改其经子史集之序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之后,即便有如王俭、阮孝绪析而为七,祖暅别而为五,也只是个别情形。由于四部分类法更符合典籍实际发展状况,满足当时学术文化繁荣进步的需求,所以,无论官私目录书籍,大都按照四部编排。至《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部分类。自此之后,四部分类法更成为书籍著录的主流与核心。到清高宗时,四部分类法发展到顶峰。

当然,谈四库不能不谈到四库修书。正是四库修书,使四库发展到顶峰;而《四库全书》及其提要,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四库上升到巅峰的标志。张之洞称《四库全书总目》打开了问学大门,是诸生良师。^①余嘉锡更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自刘向《别录》以来目录第一书:它“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庆、道光以后的通儒们,都得益于它的引导,并奉之为指南,是“功既巨矣,用亦弘矣”的佳作。^②

当然,这也是历史大势所趋。一部意在引领思想文化界、完成学术导向历史使命的大型目录著作,是盛世的必然需要与产物。对于四库功用,在四库修书时,清高宗就已从文化及治术层面强调四库包罗古今宇宙无遗,是读书治学门径,具有宣德、达教、利器的特质,且深刻道明了四库及四库发展到巅峰的杰作《四库全书》的内蕴,即承绪先贤先圣,积极弘扬和发展文明,以使世人能知晓道统的旨趣所在。这亦是寄予的千秋功业。

确如清高宗所见,在中国以四库为主流与核心的传统目录分类体系中,自西汉刘向奉诏整理书籍开始,“甲乙纪数之需”与“辨章流别”(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③就是书目须臾不可离的两项任务,有着深刻的功用与宗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官私通断,官方意志与个人好恶等,往往被中国大部分目录学家系联其中。如此而就的目录书,除对学术有总结之功外,也实属一种特殊的思想著作。故而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及其独尊过程,说是一部中国学术发展史,实不为过。这也是四部分类法能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凭藉。四库因之承载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当然,谈及四库及《四库全书》,我们自然要想到“四库学”。“四库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四库及其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不过,“四库学”这个概念,并非泛指四库,而是专门针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提出来的。

二、四库学尤具中国特色,是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学问

回望《四库全书》研究历程,20世纪以前,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四库的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上,完整系统之作不多,研究成果较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四库全书》由钦定而成,少有人敢碰禁忌。当然,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也是目录学研究对传统学术的承续,不脱有清一代学术主流的表现。这个漫长的阶段只能是《四库全书》研究兴起之前的准备时期。

虽然这只是个准备期,但在四库修书之时,就有传教士将此事传回欧洲,并寄回这些版本。^④其成书之日,更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世界性地位。作为《四库全书》的共生产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

① 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518页下栏。

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

③ 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第一》,《章学诚遗书》卷10,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95页下栏。

④ 亨利·柯蒂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唐玉清译,钱林森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全书简明目录》成书不久,即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地,至今仍助力他们的学术文化研究,贡献不小。

民国时期,《四库全书》研究解脱钦定束缚,进入初兴阶段。陈垣、董众、余嘉锡、胡玉缙、杨家骆、任松如、郭伯恭等领军《四库全书》研究,取得众多开创性成果。

同时,盛世修成的《四库全书》,因其是清朝以中华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在文化上的表现,代表着清朝无限荣光,所以它是清代及其文化的象征。故而,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后,自成书以来便经历了沧桑变迁的《四库全书》,就以既承载着清代以前中华文化,也承载着有清一代文化信息的文化传承者身份,被各界关注有加,寄予了期许,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即,在国家文物身份基础上,被寄予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而视之为“我国历代文化之所寄,一国国粹之结晶品”者^①,也大有人在。

这个时期,如何对待《四库全书》,也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因为听闻溥仪欲卖文溯阁《四库全书》,王国维建议开放《四库全书》,与内务府古器物、书画一道,供大家观览。^②1925年,为了“广国民之意”,建议国民自设艺文馆的吕思勉主张在《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出版“民国全书”。^③而在1920到1935年这15年之间的5次影印浪潮中,则有如张元济等出于“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倡导影印;^④有如徐世昌、章士钊、张学良等,为了广为流布、保护文物、传承文脉、联络中外文明、宣扬国威等,号召影印。最后,虽然影印未成,但促成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问世。前苏联列宁图书馆还因之得到了民国政府以之为国礼的馈赠。^⑤这些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不无裨益。当然,对于《四库全书》,也不乏全盘否定或批评甚烈之声。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内地《四库全书》研究趋于平缓,中国港台地区的有关研究稳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四库学”“四库总目学”“四库区域文化学”等概念被提出,研究成果大备。

198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东吴大学刘兆祐提出了“四库学”概念。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次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印出版。《四库全书》终于完成了公藏的开修初衷,进入大众视野。海内外也由此掀起研究《四库全书》的热潮。此后,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153CD图像格式的文渊阁本电子版,1999年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出版发行了电子全文检索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以新型文献载体惠及学人。与“四库学”相关的书目、文献档案,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等也接连面世。这一切同《四库全书》一道,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1998年,在台湾淡江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上,“四库学”正式被学术界提出并认可。^⑥

进入21世纪后,除新观念、新视野、新思维外,影印浪潮再次掀起。200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2014年商务印书馆原大原色原样再次影印之。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杭州出版社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和电子化,对《四库全书》及其研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与此同时,专门的《四库全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至2016年,湖南大学成立“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四库学”

① 《本埠新闻·反对四库全书押款一函》,《申报》1923年9月2日第4张第13版。

② 《筹建皇室博物馆折》,《王国维全集》卷14,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218页。

③ 吕思勉《国民自立艺文馆议》,《东方杂志》卷22号7,第89页。

④ 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载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附录《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周年纪念刊》,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页。

⑤ 上海《立报》1936年3月28日报道《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

⑥ 昌彼得的会前致辞便是“‘四库学’的展望”,并且,会后,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的《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收录有胡楚生《杨家骆教授对于“四库学”的贡献》一文。

研究各自为阵的局面至此改观。而随着“四库学”研究发展,及其呈现出的可观前景,遂有四库申遗、纂修新时代《四库全书》、后四库、后续修四库、广四库等倡议,由此也引发对“四库学”的再思考。

关于“四库学”,虽然其概念最初仅就《四库全书》及其研究而言,且于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但溯其远源,则可至经史子集四部为名为序的四分法确立时期,近源则是《四库全书》之名被确定时期。在清高宗看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的典籍,全都可入四库之目。^①加以作为四库内部成员的四部,最初是以甲乙丙丁为名的。因此,四库,是对魏晋之时以甲乙丙丁为名的四部,以及甲乙丙丁所蕴涵的先人朴素的类序观念的传承,寄予继续承绪、尊祖敬宗、不忘本源之旨。故而,清高宗的《四库全书》之名,意在借助四库及其体系,对古今中外典籍做一次全面彻底的整合统筹。既传承文化,延续文脉,又完美使“正统”“道统”“治统”“教化”即“三统一化”融而为一,成就自己冀望的为帝者的最高追求“大治”。这也可见,时代发展到清高宗时,有关四库论作就足以支撑起一门学问。

综上所述,虽然“四库学”概念起于《四库全书》及其研究,然而以它被赋予的命名宗旨、200多年来对它的研究,它已然超越之。而自该概念提出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也的确如此。由初起侧重于《四库全书》文献学方面、续修影印等,到对《四库全书》研究成果再研究,中外四库文化比较研究,探讨它在传统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构建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它的传播普及,像如何数字化、网络化、数据库如何建设,以及它的各分支学科,尤其是既可视之为分支学科,又可独立成学的“四库总目学”等。也就是说,研究的发展已使“四库学”本于《四库全书》又高于《四库全书》,达至它所代表的各层面。加以《四库全书》自身的东方文化代表,以及集四库大成的地位,我们足可跳出仅就《四库全书》谈“四库学”,而将之及于整个四库,涵括经史子集所有文献,广涉中国各种传统学问、技艺,并兼及外来学术。当然,也包括对这个体系及其所容括的中外学术文化的研究。确然,中国古典时代结束之前,四库之外的文献,概而言之,其实总体上仍可以四部归之;而我们对古代的了解,大体而言,除去少量没有文字的器物遗迹、深藏地下的出土文物外,实际上基本上全是从文献而来。从这个角度而言,四库的容量与中国古典文化是大体一致的。故而,“四库学”不只关乎《四库全书》一身,而且关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

三、辩证对待《四库全书》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四库还是“四库学”,都绕不过《四库全书》。因此,正确对待《四库全书》就显得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四库全书》很好地呼应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大势。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之际,适时出现这样一部大型书籍,完成了学术文化总结任务,保存传承了文化,功劳巨大。但是,因为清高宗的文化政策,《四库全书》在修纂中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学术文化的摧残。于此,我们要正视之,辩证对待。

《四库全书》的不足,主要来自《四库全书》收书不全、对书籍的篡改禁毁、所收书籍的版本问题、某些书籍提要存在缺误四方面。^②

对于《四库全书》及其提要,余嘉锡表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

① 爱新觉罗·弘历《文渊阁记》,见于清代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1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② 参见拙文《论〈四库全书〉的文化与遗产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及《〈四库全书〉与世界记忆遗产》(陈晓华主编《四库学》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录》以来,才有此书也”;^①崔富章称“《四库提要》存在阙误,事有固然。万余种典籍作出千古定评,本属不可能之事;时间所限,时代所限,史实考订不周,议论判断失误,在所难免”;^②孟森则云“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陟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③诸如此类的评价值得我们认真体悟。正如万里长城、大运河,我们不会因当年修建它们耗费了民脂民膏,空虚了国库,荼毒了生灵,而不承认它们举世罕匹的世界性地位。故而,虽然四库修书篡改、禁毁了诸多古代典籍,还抛弃了一些虽然违碍统治、触及统治者忌讳却有流传价值的作品,从修撰一部全书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不全等质量问题。但是,纵观《四库全书》的历史地位与学术文化价值,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里程碑的地位、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无法动摇的。或者说,《四库全书》的记忆遗产属性并不会因其不足而有所改变。

至于“四库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诸如“四库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及其分支学科传统目录学,围绕着四库在中国传统文献学及其目录学中的主流与核心地位,它们之间既是主从关系,又可各自独立成学。^④对于“四库学”与国学,应该看到:国学大体不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但是,因其名被限定在本国之学之内,故而“国学”缺少“四库学”兼顾外来学术的内涵;并且,国学在晚清至民国建立期间的内涵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思潮的产物,加以它产生的特殊环境、特定功用,因此,在代表中华本色方面,是不如“四库学”的。在学科建设方面,“四库学”要立足本土,传统与多元研究并重;既注重基础研究,又开拓新局面,扩大视野,放眼世界,多学科跨国界研究相结合;同时,要增强现实关怀,注重普及与传播,服务中华文化复兴大计。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通过研究与实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此外,“四库学”也是文化之一种。对于“四库文化”与“四库学”的关系而言,“四库文化”既蕴涵“四库学”的学术特质、容纳“四库学”的现实关怀,也囊括围绕“四库学”所发生的一切。即,“四库文化”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所涵括的内容,四库体系所展示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与知识系统,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包括由此而发生的各等事件、产生的相关学问。确然,作为文化之一员的“四库学”,势必融入文化大潮之中。所以,由“四库学”而“四库文化”,再反哺“四库学”,二者相得益彰,互利共进,相生相长,且更可服务于文化自信的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四库学”之史学价值的当代性

经世致用是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铭记历史、传承文化,其根本还在于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库学”也理应如此。因此,“四库学”的史学价值,尤为重要的是其当代性。故而,其史学价值要得以全面充分展示,完成经世致用的华丽转身,无疑需要借助其当代性。兹述其当代性如下。

一是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的当代性。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第48页。

②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叙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4页。

④ 中国文献学及其目录学有多种分类,限于篇幅,仅择传统文献学及其目录学概言之。

知古鉴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需要从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中汲取养分。四库正好承载了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

此外,“四库学”及其研究有着丰实的文献基础,所包含的记忆遗产不菲。为使这些记忆遗产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之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不失为佳选良机。而在把它们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无疑也可促进对它的研究、开发利用,扩大它的影响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四库学”建设,并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展示中华风采,提升中华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鼓励世界各国参与此项活动,使更多记忆遗产得到保护开发利用。

二是与国际接轨的当代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屹立世界,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我们需要输出具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传统文化,方可最大程度彰显中国特色。我们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知识系统的主流就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而且,这个体系和系统中蕴涵着丰厚的记忆遗产。因此,把“四库学”推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中国的记忆遗产推向了世界,无疑推广了独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传统文化。这既可为它们打造优良平台,提供更大的舞台,扩大影响力,推动其研究,又可在与世界接轨中极大地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是传播普及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当代性。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任。要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得弄清楚中国特色的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问题,亦即传播普及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应当先行。这是主干、核心。不过,传播普及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系统,并没有可借鉴的行之有效的成例,这就需要我们建构。而四库及其学问“四库学”,既是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又承载着传统学术学科体系及其知识系统。如果以此为切入点,借鉴前贤今人的理论与实践,是可以得到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继而,可再扩播之,普及之。

四是《四库全书》自成书以来就拥有世界性地位,曾做友好大使,传播中华文化,当今仍可作为国际上传播中华文化的纽带,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成就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总之,“四库学”及其研究在保存、总结、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中国特色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等方面,都可有自己独到的贡献。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吸收其中的优秀内涵,全面发掘“四库学”,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四库全书总目》昭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历史自觉*

陆建猷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苏鹏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四库全书》纂修是18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观念文化大事。《四库全书》纂修完竣,创造了中国学术与学科体系的巅峰气派,给中国学科和图书分目的国别特质,写上了浓墨重彩的终极句号。《四库全书》及其共生品《四库全书总目》,与之后通行的国际一般学科和图书目录,形成了划时代的对比,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哲学体系创新:中国哲学史”(项目编号:18FZX059)的阶段性成果。

也使中国传统学科分目及其图书目录特色,走向了古典与传统的终结。原典的《四库全书》、概括的《四库全书总目》、现实开展的“四库学”研究,是对中国古典学科分目与传统图书目录的文化遗产与史学再认识。

一、中国古典文化如何展示学科的分属自觉

古典包括古代典章制度、典籍经艺、典范事物等。本文所讨论的“经史子集”属于古典之义中的典籍书册。思想学说与学科原理怎样传世载述?识读与理解的经验告诉我们:经由典籍书册载述而与时传世。目录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了书籍的意涵骨架,为识读者指引了读书与治学的门径,是书籍反映学科的思想学说与原理概念的次序体制,汇集了书籍的书名、作者、出版、内容、收藏诸要素,以直观形式向阅读者展示了书籍的概要及其义理,使识读者对书籍的学科属性与义理知识一目了然。那么,广大识读者经历了何种形态的目录体制呢?此为识读者读书与思考之时需要伴随的知的问题,因为它包含着文化遗产的内蕴。这里的“目录”包含古典目录与近代以来的国际一般目录。知晓二者,对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而培植个体的文化自信的心理意识,具有良知、理性意义上的支持作用。

那么,中国古典目录呈现出什么形态?

一是反映“六经”旨趣的经部目录所呈现的经典性形态。夏商周三代成书的《易》《书》《诗》《礼》《乐》《春秋》,是世界历史“轴心时代”所标识的元典,是“公元前6世纪前后1000年间”的元初文典,与印度元典《吠陀》及诠释它的《奥义书》、波斯元典《古圣书》、希腊元典《荷马史诗》、希伯来元典《圣经》一道,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早期的古典目录《礼记·经解》是较早记载孔子论说“六经”之名与教化功能的经典篇目。^①《庄子·天下》是儒家以外的道家论著,论述“六经”对中国社会观念的经典原理。^②《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揭示了元典旨趣,论述了“六经”对于中国思想的原理性。^③《汉书·艺文志》举述“六经”文义,阐述其对后世中华观念文化的原理意趣。^④孔子之论“六经”,以社会教化应用为式;庄子之论“六经”,以抽绎旨趣为先;司马迁伫足西汉,以史家视野论述“六经”义理;班固置身东汉初期,以史学思维解读“六经”意旨,为魏晋以降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目说、隋唐以降“经史子集”四部分目说,奠定了经典及其诠释的经学古典目录。

二是史部目录所显示的史学形态。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历程,经由历史学者记载而成为史学典籍。《礼记·玉藻》追溯中国史籍的生成形式,“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⑤《世本·王谟辑本》也说,“宋忠曰:‘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矣。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者也。’”^⑥在秘书性质与角色的史官学统传习下,中国历史学对于历史生活多元主体中的“主导”群体示以学科与职业的长期重视,编年史体裁下的《春秋》、《春秋》三家传、《竹书纪年》;杂史体裁下的《尚书》《国语》《战国策》《世本》《逸周书》等,它们以文本载述历史认识,表征历史学者对于黄帝开创中华文化以来至于夏商周三代的主观

① 《礼记·经解》,《四书五经》中册,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273页。

② 《庄子·天下》,《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16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130,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297页。

④ 班固《汉书》卷30,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23页。

⑤ 《礼记·玉藻》,《四书五经》中册,第165页。

⑥ 《世本·王谟辑本》,《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页。

认知,以主观的文本史学观照社会生活的客观进程及其经历,为魏晋以降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目说、唐以降“经史子集”四部分目说,奠定了史籍及其诠释的史学古典目录基础。

三是子部所呈现的古典思想学说形态。子部及其所展示的子学,其要义是集合学者思想学说的诸子百家之学。此处所举述的“诸子百家之学”,指从黄帝肇端、经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思想学说,子、士及其学派是创设这些思想学说的庞大主体。它们包括:儒家学派以政治哲学指向世道观念;道家学派以自然理论约引人为意识;墨家学派以兼爱非攻理论调处社会矛盾“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法家学派的治教思想;名家学派以论辩名称与实在来彰示逻辑思维;阴阳家学派以阴阳指代对立激荡的关系;纵横家学派以方略取予诸侯的谋略论思想;农家学派授以时令与植养的同—性法则;杂家学派对流派学说多元的兼综;兵家学派授以国家军事与用兵战略;术数家学派授以思维与气数相契合的论识;天文家学派授以天体运动的科学思想;医方家学派授以医经和医方的医学思想;小说家反映社会生活非确定性的舆情意识;历法家学派从天运与地候之契合摹制规律的历法论。这些思想学说,昭示了“六经”之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评述中国思想家群体的子士阶层时,表彰他们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①诚然,“立说者”能自成一—家之言,能自立一家学说,是中国思想学说大系里哲学、政治、科技、艺术的栋梁,担当着中华民族观念文化创设的责任。

中国古典目录自书籍肇始之后,从无目录走向自觉分目,至“四部”成为核心、主流。“四部”第一部的经部,“六经”自为总体,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子目之始,阐释中国以“六经”为本的思想内蕴。从黄帝开创中华文化肇端,经尧、舜、夏、商、周而观念成形且概括成书,经典因其王者之佐而为历代王朝重视,于是拥有了四部之首部的地位。《易》记述先哲关于变化移易的法则,《书》记述尧、舜、禹至春秋时期秦穆公之间的官方政治理论,《诗》记述周代以“风雅颂”为类目而以“兴观群怨”为教化的理念,《礼》记述《周礼》和《仪礼》基础上的关于礼制与礼仪的礼学文论,《乐》记述黄帝以降制作乐器与乐章而付诸三代礼乐文化的音乐理论,《春秋》记述诸侯国史书及分封制下正统与僭越的政治关系。“四部”之二的史部,至《四库全书总目》时,正史位列第一,编年随后,别史等类目接踵,充分体现古典史学体制的特色。“四部”之三的子部,以“子学”发其端绪,风起云涌的“诸子百家”各为具体分目,大幅展示春秋气象。“四部”之四的集部,其意为汇取众篇而集为一书,从《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开源,至《隋书》的《经籍志》才确定了“集部之名”。至《四库全书总目》,所列最先、最古者为楚辞类,别集次之,总集再次之,诗文评晚出,词曲则其闰余。

二、古典目录如何实现其对学科的涵盖

社会生活以历史性进程表现自己的运行。组成这一进程的是与时俱增而富于特质的诸多事件,语言文字与科学技术以智能文化支持这一进程,器物制造的物质成就以物质文化支持这一进程,制度规则与风俗彝伦以规范文化支持这一进程,哲学宗教与文学艺术以观念文化支持这一进程。上述物质形态的文化、智能形态的文化、规范形态的文化、观念形态的文化,都被魏晋南北朝的“甲乙丙丁”、唐以降“经史子集”四部各归其类,科学合理地汇入组成中国观念文化大系的学科及其目录中,即“四库”体系。而这些组成中国观念文化大系的学科及其目录,从汉代自觉开端,就以多种目录形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91《子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769页。

式与时俱进地开展其古典形态及体制的建设。其中,“四部”目录是核心与主流。

中国古典目录开启于西汉初期。《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①班固的这番言说证明,礼乐文化繁盛、经典文献发达、历史学视之为辉煌的先秦时期,在汉代以前秦朝这个短暂王朝时期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幸运的是,学科复生与书籍创写的历史转机,在西汉初期开始出现了。走出夏商周三代贵族政治传统之后,首个平民政权的刘汉王朝,向中国历史奉献了尊文重道的“文治政策”。尤其是汉武帝,面对“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的现状,表示“朕甚闵焉!”他重振文化,以为使命。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述“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②汉朝建立了国家藏书机构,设置了著书立说文官,搜集宿儒、先生对先秦诸子的传说,收藏为国家图书典籍。到汉成帝时,则专门指派大臣陈农,执掌国家遍求天下遗书之事。

古典观念文化是怎样在汉代重生的?文化建设昭示着社会主导系统的良知善政。摆在刘汉政权面前的几个紧迫使命:一是怎样修复或改进“书缺简脱”与“书籍散亡”的年久自然毁损的状况,二是怎样重建与恢复“焚书坑儒”劫难之后的书籍秩序,三是如何彰显平民政权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建设和发展的问题。史家班固及其《汉书·艺文志》,站在东汉初期,做出了可信的史实追溯“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③学科分目与书籍目录展示着科学体系的机体组织。它们史无前例地化为秩序法度,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以独具中国学科分目与书籍目录的气派,矗立于中国观念文化的辽阔视域。

三、《四库全书总目》昭示中国目录的国别气派

纂修《四库全书》给中国典籍书册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典籍总汇,以及以中国本土特色目录的形式集中展示中国学术文化与思想涵蕴,开阔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视野。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清朝政府与国民学界知道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实况:子士迭代,学思宏富;学海书山,卷帙浩繁;典藏尤丰,书籍大兴;学术文化繁盛,学界官方都期盼国家出面主持一次大型国家文化汇集,以总结发展到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成就。然而,纂修这样的大型丛书,必须建构目录秩序。《四库全书总目》楷定学科分目,即以“四库”体系系联丛书编纂,对中国典籍书册进行一次全面系统而最大规模地汇集,《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书籍以目录体系框约,对中国社会生活进程中的观念文化进行了中国风格的建构。

《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中国书籍的宏富与国民识读,极大地激发了国人扩充自我的理性自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为:三千四百六十一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保留而未收入的存目书籍为: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涵括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如此一万余种书

① 班固《汉书》卷30第1701页。

② 班固《汉书》卷30第1701页。

③ 班固《汉书》卷30第1701页。

籍,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书籍的总量,它们主要散在中国民间。经过以乾隆为首的官方出面有偿征集,使广大藏书家庭踊跃应征献书。所献书籍,则获具要素介绍、内容提要、分类编排等,满足了后世阅读理解的思想文化需求,并提供给世人“稽古佑文、聿资治理、嘉惠后学”的帮助。书籍以宏大数量示人,观念文化以典籍书册为载体,其气象何等恢宏!

中国典籍书册的目录体系是否呈现为一个自觉的完善统系?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发展世系可以回答世人。其一,刘向、刘歆父子开创汉代目录之学。刘向开汉代目录之学之端,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创建中国目录之学。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基础上,总括群书而区分部类,撰成《七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略”下分种,“种”下分家,为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奠基了建制之源。西周“分地以封诸侯”的分封制与“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的爵位制,^①使“礼乐文明”的礼治落在社会秩序的实处。“六经”通行,史籍发皇,子学争鸣,呈现出时代观念文化繁荣的现实。其后则生出混乱局势:诸侯力政而僭越正统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走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秦始皇推行集权意识形态而“焚书坑儒”、秦汉之际王朝更替的战乱,使中国古典遭遇严重毁损。西汉一统后,意识到不能“以马上治之”,于是再拾文化重建。具体到个体,则有刘向、刘歆父子以建制中国书籍目录体制,践行其学术文化使命的自任。

其二,魏晋之际产生的“甲乙丙丁”为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甲乙丙丁”的四部说,采自天文历法的“干支”学说中的“天干”前四位。《隋书·经籍志》如是记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细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子遗。”^②“干支”学说反映中国天地观念,以天体为主干,以地理为分支,天干与地支合域而为整体。先民从殷商时期起,即以“干支”概念相配合,而用以纪日、纪年、纪月、纪时。故“甲乙丙丁”四部说比之后来的“经史子集”四部说,呈现的是中国朴素的学科分类观念。

其三是东晋产生的“甲乙丙丁”为名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南北朝逐渐有经史子集之名,唐所修《隋书·经籍志》则确立了“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部之学。东晋开始,“甲乙丙丁”的“经史子集”四部为“经史子集”四部所扬弃,南北承袭之,学科分目与时趋向确切明朗。梁武帝普通年间,梁国学者阮孝绪撰著《七录》,前“四录”即“经史子集”:“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剖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③梁武帝是一位博学的帝王,其所赏识的《七录》作者阮孝绪,是一位怀抱卓越才学而隐居不仕的梁国处士。阮氏的卓越之处在于,使中国目录学呈现出划时代性,即从“甲乙丙丁”的“次序四部”说,逐渐走向“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目”四部说。到《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部之学最终确立,并成为主流与核心。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系统,至此建构完成。

① 《礼记·王制》,《四书五经》中册,第66页。

②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32,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906页。

③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32,第907页。

其四是清朝乾隆时代产生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库”之学。“四库”之名起于唐玄宗时期。唐玄宗时,在洛阳、长安二都,分“甲乙丙丁”四库,储藏“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四库”即成为“四部”的代称。《四库全书总目》以著录与存目的“四库”分类,呈示给清朝政府与当时国民:当时官府所能征集到的所有官私藏书,是民族国家观念文化以典籍书册涵载总量文本的展示;它们是中国书籍目录从西汉《七略》、魏晋南北朝名“甲乙丙丁”之“经史子集”至“经史子集”四部、南北朝之名非实至的“经史子集”四部、唐“经史子集”四部以来的集大成者,集萃了以上目录体系与目录观念的优点,以中国古典目录的终结形式,反映了中国科学的学术实际;在19世纪晚期“世界目录一般”到来之前,画上了中国目录特制体系的显赫句号。

目录学史启示世人:中国古典目录学与现代国际目录学呈现出差异性,中国古典目录是中国传统特质的科学体系及其认知,它在“国际近代目录学”出现之前早已存在,独立自主地在中国观念文化轨辙上运行,其本土性历史地存在于客观事实中。与之相比,“1890—1910年起”流行于世界范围的国际近代目录学显然晚迟。历史学一般以“援前证后”而求历史必然性为学理法度。时下一些论者习以为常地站在主观立场去叙说历史因果及其变迁,以致武断地宣布“中国没有目录学”,实为缺史乏知的失当言表。

结语与问题

“四部”至“四库”目录学体系,昭示中国科目与目录学的本土特色气派。《四库全书》及其《四库全书总目》,建构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巅峰。它们向世人展示出中国书籍的多重精神:一是科目种类与宏富卷帙所呈现的意义。《四库全书》所著录的从先秦至清乾隆以前的重要典籍,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私家藏书及官方石室金匱藏书的贡献,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家庭与社会的文化生活与价值观念,体现着中国国民的理性财富。今天开展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的故事”的倡导,《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怎样与国家的政治倡导结合推进?

二是物性形质的书籍是否诉求“类书”“丛书”的时代性纂修呢?中国书籍从甲骨走向金石,金石走向简帛,简帛走向纸张,直至现代的电子版本;三国时有了类书,宋代时有了丛书;书籍印刷史表明,优质纸墨保存期约为一千三百年,普通纸墨保存期约为三百年,电子版保存期尚在探索中而周期更短。从单行本到类书、再到丛书,现代社会怎样考虑《四库全书》式的“后四库”与“后续修四库”等中国书籍的盘点和纂修呢?

三是国民怎样识读与应用,从而发挥国家图书财富的价值?读书扩充人的心量,知识支持人的理性。轻视读书而重视手机阅读,正在消弭着国民经由读书而涵养良知、理性的理智追求,造成与世界理性公民的风仪落差。中国传统为何钟情于开展国家级的类书与丛书纂修?《四库全书》纂修的授意者乾隆以为“朕稽古佑文,聿资治理,几于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緲,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秋法鉴,嘉惠后学。”^①《四库全书》及其《四库全书总目》怎样发挥其“稽古佑文,聿资治理,垂范方来,嘉惠后学”的教益作用?“四库学”及其研究与国民的热情识读,是新时代的文化传承,具有新塑文明价值的意涵,国家怎样倡导国民经由读书学习而培植“文化自信”意识呢?

^① 《圣谕》,《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页。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历史观念探析

陈良中（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四库全书总目》是对中国几千年学术及其经验,以及知识体系的全面总结。它以当时所有可以保存的书籍分隶四部,全面系统地涵括其中的知识。这套知识体系也是反映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观念体系。它的每一部类都涉及该门类的重要著述及理论总结。其中,史部是对中国数千年民族史学实践和理论的全面总结。梳理史部提要,有利于我们真切理解中国史学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民族学术个性,反思近代以来以西方学科标准切割自己文化传统的弊端,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一、以正史为正统的史学体系

《四库全书总目》以提要的形式对《四库全书》所著录或存目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籍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带有鲜明的正统观念。就史部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书籍的选录、分类以及提要的撰写,是对中国数千年历史书写的理论梳理和总结,有鲜明的揭示古今成败之义。为尊正统,它以正史统摄史部正史之外的其他子目,形成以正史为纲的分类体系。以正史为纲,不仅规范了史书撰写体例,而且还是评价其他史书的价值尺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①它记载了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脉络。它以纪传体为正史首选,是因为纪传体是“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用此体例书写的史书是连续的、完整的,呈现了一个民族的统序。不过,关于正史,还有如《史通》等撰述中所区分的编年与纪传二体。四库馆臣对此的态度是:不取《史通》等说法,而令编年类史书“次于正史”,使之与正史“相辅而行”。^②因为他们认为,编年一体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所以说,《四库全书总目》正史包含了一个民族连续、完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考,具有与经书一样垂示万世、正人心、息邪说的经世功能。至于其他史书体例,因为肩负不起这个重任,也就只能作为正史之流亚,但都以正史为纲。故而,《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八类都参考纪传体例而成,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五类皆参考正史诸志体例而来,史评乃参考正史论赞而来。亦即,后世一切史书体例都是参考正史体例而成。此说虽可质疑,但四库馆臣有以正史牢笼各体史书的观念,却是无疑的。

正史作为史学之大宗,其记载具备时间的连续性,其内容具备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官方的认定性,故而纳入正史的史书也就意味着它所书写的朝代具有了政治的合法性,是正统自然延续的一环。而官方认定之外,虽然同为记一代史实之书,却退而为编年,为别史。其中,别史被用来分隶“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③如郭伦《晋记》、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明书》、傅维麟《明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于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④至于《东观汉记》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397页中栏。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7,第418页上栏。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45页下栏。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60页中栏。

《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但“书已不完,今又不列于正史”,^①或为私人撰述,或不完整,或未被官方采入正史,也划入别史以示区别。归《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于别史,体现的正是四库馆臣严格以官定正史为正统的分类观念。当然,四库馆臣的分类亦有可商榷之处。张之洞《书目答问》云:“别史、杂史,颇难分析,今以官撰及原本正史重为整齐,关系一朝大政者入别史,私家纪录中多碎事者入杂史。”^②抛开这些分歧不论,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建立起来的清晰的史学体系。这是一个知识和价值融合的体系,确立了以史学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观念,并以二十四部之数记录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正统与道统谱系。这一谱系蕴含着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的丰富内涵,对于促进民族凝聚、多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在分类上,《四库全书总目》采用以类相从的编撰方法,打破了按纯粹知识分类的僵化。正史类尚有训释史书音义的书籍,如《史记索隐》;有以正史通例掇拾遗阙的,如《补后汉书年表》;有校正字句的,如《两汉刊误补遗》。专题之书,如《通鉴地理通释》则附《资治通鉴》之后。馆臣以为“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③子部、集部之书均以此标准分部隶属。以四部董理中国数千年学术知识,若以现代学术的观点来看,各部之书皆有不合理之处。如训释音义之书当隶属语言文字学;校正字句之书则属于校勘学;时令类记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属社会学范畴;又有地理类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今日归入地理学。但在“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民事即王政”的古代中国,^④独特的四部学术体系将之归入史学。这种分类方式具有独特的中国学术品格,是理论与实用相结合的典范。至于以四部涵纳所有知识,一切以经部价值为准的,则是一个以求善为核心的学术体系。

二、对丰富的史书书写经验的总结

四部之史部,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揭示了中华民族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随时对民族自身文化活动的反思的优秀品质。《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出了全面总结,给世人呈现了数千年史书书写的演变,清晰地展示了史部书籍内在的学术特征,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书写所积淀的丰厚、清醒的历史自觉意识。

汉代史书不多,《汉书·艺文志》以《战国策》《史记》附见《春秋》。其后著作渐繁,《隋书·经籍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等十三目。《隋书·经籍志》以《春秋》为古史记述之正法,著述依《春秋》之体谓之古史;新旧《唐书》《史通》则改古史为编年。阮孝绪《七录》著伪史一门,《隋书·经籍志》改称霸史,记偏安一隅之政权,四库馆臣列入载记,谓“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⑤史书各类称谓随时代而变化,蕴涵各时代特色;各时代发出的对历史的自我意识,是对历史书写的自觉思考。为此,史书类别代有新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即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⑥正所谓史书书写体例创因相续,因袭者众则独立一家。四库馆臣称“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⑦周代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53页下栏。

②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397页中栏至下栏。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7,第592页下栏。

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第582页下栏。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45页下栏。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9,第437页中栏。

及以前史书书写以编年为主;至司马迁《史记》出,则因袭纪传体者众;袁枢所创纪事本末体出,则因袭纪事本末体亦多,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由此独立成家。其余史书体裁皆存在类似现象。四库馆臣以此为例,揭示史书书写的推陈出新,以此展示一个民族巨大的文化创新能力。

创因相续,丰富的著述自然推动了对历史个性的思考。集中国古典目录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其十五类及十六子目就是通过类目及其提要的形式对纷繁复杂的著述进行提炼、概括,是学术自身的反思、升华。如诏令奏议积年增多,资料渐丰而独立成类,四库馆臣就翔实地梳理了它独立成类的过程,揭示了它成类的因果。《汉志》载奏事十八篇,附于《春秋》之末,材料太少而不独立成目。《新唐书》附诏令于起居注,起居注记人君言动,诏令多出臣子之手,名实难副。《文献通考》以奏议自为一门而居于集末。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之别集。当然,诏令奏议以文辞华美而入集部,并非完全无理可据。馆臣亦谓“诏令之美无过汉唐,……汇而聚之以资循览,亦足以观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之遗。”^①诏令奏议本就具有文章学价值,不过,从价值尺度来看则不然。诏令奏议发于庙堂,针对的是军国大事,而“治乱得失于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与抒情写意的文词之作有别,列于集部“抑居词赋,于理为褻”。在馆臣看来,“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②故而,馆臣于史部列诏令奏议为一类,希望它能与纪传互考,揭示了诏令奏议类由依附《春秋》、起居注到集部之一目、再到史部之一目,由名实不副到名实相协的变化历程。又如史钞类。馆臣认为,孔子删取帝魁以后书百篇为《尚书》,实为史钞之祖,《宋史》始立此目。其抄史各有目的,有专抄一史者,有合抄众史者,有离析而编纂之,有简汰而刊削之,有采摭文句者,有品文字者,有明音训者。^③史钞源起、发展等传承之迹清晰可见。

总之,史书由《汉志》中的附《春秋》到《隋志》中的十三类,再到《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十五类,分类与史部著述多寡、损益、变化相因,图书分类逐渐符合类的本质,渐趋精细合理。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时学术实际,分史部为十五类,且皆能考镜源流,揭示其学术演变的轨迹和规律,呈现出了馆臣自觉的历史意识,展示出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历史书写,不愧为中国目录学的杰作。

三、重考证的史学精神

历史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真实记录。但是,任何记载都无法摆脱记载者思想的影响。史家持有何种立场,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总叙》及提要中持有何种历史观念,对于史学有何思考,这是一个需要深度发掘的学术问题。四部分类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知识积累的系统梳理,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精神,所谓“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④历史文献的价值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没有真实的史实,历史就会消解。四库馆臣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表述,明确提出“征事”的求真诉求。《四库全书》史部诸书即以“求真”为采录标准,“其有裨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⑤亦即,有益于正史的史书,如字词训释考辨、史实辩证、制度文物考论等,皆可收录。的确,史实背后有史家的求真价值诉求。所以,四库馆臣又称“鲁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5,第495页下栏。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8,第1267页上栏至中栏。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第577页下栏。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91,第769页上栏。

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397页中栏。

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①他们认为,李延寿“采杂史为实录”的《南史》又“岂可尽信”。^②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强调,历史当以真实事件为根基,当重视真实。故而,史书应于史实中蕴含对是非的价值评判,读史也当由史实而观是非。事件的真实性是史学的基本特性,这是历史与小说的边界。因此,它要求杂史所收之书,从价值层面来看,要“事系庙堂,语关军国”,具有宏大意义;从事实层面来看,要“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真实可考;而“语怪,供诙,里巷琐言,稗官所述”,虽记历史人物但荒诞不稽者则应入于杂家、小说家。^③由此可见,馆臣对于史学“求真”精神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当然,“求真”必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提要中充分展示了重考辨的基本精神。四库馆臣认为,裴松之注《三国志》“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类”。^④意在告诉世人,裴松之《三国志注》杂录神怪之事,且不资考证,实不可为训。他们认为,《宋史》“舛谬不能殫数”,并列柯维骥《宋史新编》、沈世泊《宋史就正编》所考《宋史》纪、志、传之间矛盾处,以及与他书抵牾者十数处,且又自疏《宋史》之失数条。如朱倬登进士,《宋史》本传载为宣和五年事,而据《徽宗纪》实为宣和六年;又如殿试,《宋准传》载在太宗朝,据《选举志》实为太祖时事;又考晁补之、谢绛之世系之误。这些考证都足以订正《宋史》的谬误。又如《史记》的提要详考《史记》十篇佚失的事:张晏以为司马迁没世之后亡佚《景帝纪》《武帝纪》等十篇;刘知幾《史通》“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之说;而馆臣考今传本《日者》《龟策》二传合并为一,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认为今传本是补缀残稿的明证。四库馆臣援引历代学者所考为证,如周密《齐东野语》所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宏子孙爵之语”、焦竑《笔乘》所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之语、王懋竑《杂著》从体例上谓“《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等,指出今存《史记》确实有所散佚,而且兼有所窜易,但全书主体依旧是司马迁所著,批评焦竑据《后汉书·杨经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余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⑤并最终论定《学海类编》中所载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荒诞不足为据,是臆为刊削《史记》而托以司马迁藏于名山之旧稿。四库馆臣贯穿众说,详尽考辨了《史记》补缀问题。总之,《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部所录之书所作的提要几乎都有考证,可见馆臣对史学求真的精神有深刻认识并自觉践行这一精神。

此外,“求真”精神也是四库馆臣收录史家著述的基本原则。史部收录了大量宋明以来私家著述,而宋明人又好议论,多分门户、立朋党,以笔墨相报复,这些私家著述记载多有是非颠倒之处,但四库馆臣认为,“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⑥又如,谓《唐大诏令》“多足以裨史事,《两汉诏令》虽取之于三史,然汇而聚之以资循览”,而“两宋以后国政得失多见于奏议”。^⑦《四库全书总目》设置“诏令奏议”一目也在于其有补史实。凡此可见馆臣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397页上栏。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6,第409页下栏。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1,第460页下栏。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403页下栏。

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397页下栏至第398页上栏。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397页中栏。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5,第495页下栏。

以是否可资考证为著录以及臧否的一个依据。而翻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确随处可见精细的考辨。这充分体现出馆臣重考证的精神。

四、求善的价值诉求

史书的求善,就大的层面讲,就是全面系统总结并反映时代需要的价值理念。当一部书汇聚历代各体典籍,并融入清晰的是非观念,这部书就具备了建构民族价值体系的重要功能。《四库全书总目》就是这样一部典籍。

《四库全书总目》体现的民族价值体系是全面系统的。例如,其中的正统价值观念就异常突出。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以官定史书为正史,即“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的史书。^①正史关乎正统的传承。综观被《四库全书总目》确定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少数民族与汉族建立的政权所修史书都并列其中,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冲破了夷夏之防,但凡继统中原、传承中华文化者都被视为正统,这种正统观念无疑也是进步的。四库馆臣指出“元破临安,宋统已绝……辽起滑盐,金兴肃慎,并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②盛赞金朝“典章制度几及汉唐”,谓《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③而批评王植《读史纲要》“以西夏、辽、金并列,尤为纰缪”,^④又批评王洙《宋史质》:“以明继宋,非为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⑤为《辽史》《金史》争正统,就是以是否继统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来定正闰。而陆游《南唐书》于烈祖、元宗、后主皆称本纪,馆臣谓“诸侯而称本纪,循名责实,再三乖谬”。^⑥显然,南唐一朝偏居江南一隅,不符合继统中原为正的史观,馆臣自然以诸侯等视,责备陆游不明史例。参稽宋、辽、金三史平列,对修三史的元朝进行表彰维护,以及对陆游的批评,可见馆臣抱有以“跨有中原”之政权为正统的观念,以及通过史书来端正名分纲常的价值倾向。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还体现出清晰的大一统观念。例如,批评《嘉靖广西通志》:“惟土官已隶职方,命以爵秩,而列之外纪,非大一统之义。”^⑦因为职掌边地之土官本由中央任命,所管辖之地也本属国家区划,非附庸之国,作者却列于外纪,显然不符合大一统的国家大义,也有违实际。又如《蒙古源流》一书,四库馆臣认为,“于例应入载记类”,但“所述多元朝帝王之事,与高丽、安南诸史究有不同,是以仍编于杂史”,又谓“国家万方同轨,中外向风,蒙古诸部久为臣仆,乃得以其流传秘册充外史之储藏,用以参考旧文,尽却耳食沿讹之陋,一统同文之盛治,洵亘古为独隆”。^⑧蒙古人已成为大清臣民,所辖之地已为皇土,与附庸之国截然不同,因此,隶《蒙古源流》于杂史,有一统之大义。又,史部地理类首宫殿以尊宸居,次总志以明大一统,则是正统与大一统观念的合一。

史书的求善,从小的层面讲,就是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史书需要能够有益于治,垂鉴后世,有益民生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无论类目安排还是提要,都鲜明地表达了这些向善的价值诉求。从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第397页中栏。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55页上栏。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6,第414页中栏。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8,第436页下栏。

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54页中栏至下栏。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第588页上栏。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3,第641页中栏。

⑧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1,第467页下栏。

史部类目安排上看,馆臣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垂鉴之旨。如安禄山、黄巢、刘豫等逆乱之人、割据之雄,其事涉一代历史大事而不能泯灭。《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这类人“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①故传记类以“逆乱之人,自为一传”,立“别录”之目,“示不与诸传比”。^②又有“割据僭窃之雄,别附载记。征讨削平之事,别入杂史”,^③又谓“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于义为允”,^④单列一类,以示有别。此外,传记类立“名人”一目,所录“大抵名世之英,与文章道德之士”。《四库全书总目》谓“不曰名臣,而曰名人者,其中或苦节卓行而山林终老,或风流文采而功业无闻,概曰名臣,殊乖其实,统以有闻于后之称,庶为兼括之通词”,^⑤一字不可苟且,深得《春秋》笔法之神韵。其职官类的设立,是因为“议政庙堂,乃稽旧典”,“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采录“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儆戒训诰之词,今厘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使后世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⑥又政书类所录为治政掌故制度,可为后世治政之鉴戒者。名臣言行录一类书“定千秋之品则只字不可诬,取一节之长则片善亦可录”,“采前言往行矜式后人,自当仰溯名贤,用垂规矩”。^⑦垂鉴后世、有益于治,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书类目安排与是否著录的重要价值基础。因此,像李贽《藏书》,自然会赢得《四库全书总目》“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贻害人心”的批评。^⑧

总之,《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蕴含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丰富的史学实践和理论思考,是需要大力发掘的宝藏。

然而,遗憾的是,近现代西方学术体系的引入,使我们固有的知识分类体系被彻底打破,道术将为天下裂,中国固有的传统知识被以新的学科标准重新归类,中国固有的价值体系被割裂,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不少断层。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四库全书总目》的优秀内蕴,继承和发扬之,在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全面反思和总结民族文化的自身品性中,增强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推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文化传承视域下的“四库学”研究及其反思*

张永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

《四库全书》自编纂之日起,因其显赫出身及庞大的文献典藏,一直处于某种或显耀或神秘之地位。在史学研究中,无论是从文献学角度还是思想史角度,《四库全书》的重要地位都毋庸置疑。作为对其重要地位的回应,学界近年来对四库学的研究和侧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端学术论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7,第513页中栏。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4,第577页中栏。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4,第577页中栏。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6,第582页下栏。

⑤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7,第517页下栏。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9,第682页上栏。

⑦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1,第553页上栏。

⑧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第455页中栏至下栏。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中的知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CZX028)的阶段性成果。

坛的召开。比如“四库学高层论坛”最初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起,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后续承办,逐渐拓展开来,在学界影响逐渐扩大,参会专家也横跨文史哲诸领域。第二,四库学研究平台的建设。具体表现为“四库学研究中心”的陆续成立,以及“四库学研究论集”的持续发行。前者为四库学研究提供了具体平台建制,而后者为研究成果的集中发表提供了固定空间。第三,在研究互动交流基础上,四库学研究逐渐由中国走向世界。具体表现为,近些年来四库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推动,将《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纳入规划(主要由首都师范大学陈晓华教授召集)。

尤为要者,“四库”藏书及其蕴含的思想遗产又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遭遇有着某种深层联系。一方面,“四库”藏书对于传统文献有着丰富、自觉的筛选、甄别、收录;另一方面,“四库”藏书的系列案语(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又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价值观及西学观。由此便可以与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乃至“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判反省呼应起来,作为文化观、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从中国发现历史”,可以有某种深层的启发意义和文献依据。我们知道,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遭遇的危机,贺麟先生等一些学者明确界定,认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袭,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①那么,我们想追问的是,在文化传承视域下,如此如火如荼的“四库学”热潮,对于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危机”,^②“四库学”研究能否予以回应?又如何予以回应?还是说,“四库学”研究只是学者们在象牙塔下的热忱宣泄?如同原有的皇家藏书束之高阁秘不示人一样?抑或通过“四库学”研究可以从某种角度回应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不仅能够自觉继承《四库全书》蕴含的思想遗产,而且可以通过研究推进文化传承及其创新。愚以为,这才是“四库学”研究热潮的意义之所在。

下面将分别从思想史、目录学、文化学三个角度予以诠释。

一、思想史视角:文献集成中所蕴含的思想遗产

“四库学”研究中占很大份量的一块是文献学研究,四库所收书籍的版本的确存在可质疑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四库学”文献集成的正面意义,与传统“艺文志”之类相比,它明显有着容量庞大的优势,而不仅仅是“书目志”;与《永乐大典》等藏书相比,其优势表现在分库、分地域保存的版本保全优势。由此而言,四库的文献保存之功不宜轻易否认。然而,我们不应止步于此。对于“四库学”的研究,当由“文献”而“思想”,由“文本世界”而进入“思想世界”。

就思想世界而言,“四库”系列藏书蕴含的思想史遗产值得留意处有三:第一,对传统价值观的自觉继承和优化。满清作为外族入主中原,他们如何看待儒家传统?其接受文化同化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在“四库”系列藏书中可以得到明确的思想依据。比如对于“易学”之“卜筮”与“德义”的分殊,很明显,“四库”编纂者自觉接续了孔子“由卜筮而德义”^③的传统。^④此种诠释模式上承《汉

①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0页。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页。

③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类似讨论比较多,参见廖名春《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林忠军《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向》,《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张克宾《由占筮到德义的创造性诠释——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发微》,《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李学勤《周易溯源》“孔子论《易》部分”,巴蜀书社2006年版。

④ 张永超《“易学两栖”何以可能?——以“易学类”文献为例再论四库分类中的知识谱系问题》,载陈晓华主编《四库学》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书·艺文志》,从义理层面讲,则是对传统儒家易学观的自觉继承。^①第二,对于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思想有所甄别、侧重。他们如何看待西方的宗教、科学、技术与文明传统?此种“中西之争”延续之晚清乃至今天,“四库”系列藏书给我们提供明确的思想史依据。例如,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选取与侧重。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有个案语值得留意:“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②此种重视西洋“技能”而对其“学术”表示排斥的心态延续至晚清乃至民初,无论是“师夷长技”还是“中体西用”,都可以看到此种西学观的回声久远。^③正是在上述传统价值观以及西学观的裹挟下,当时的士林阶层逐渐走向晚清、步入民国,乃至建构着今日的潜意识。第三,文献库存中所蕴含的传统认知模式和知识谱系。这具体表现为《四库全书》对于传统文献的收集、分类、诠释,为我们探究其“认知模式”提供了思想依据。以“易学”为例,四库明确将“道”与“术”区分开来,对应的文献分别置于“经部”和“子部”,这一点从《四库全书总目》案语中可以得出丰富依据。^④

这些才是任何原典文本所无法替代的部分。通过“四库系列”之“提要”“案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人以及官方对各种文献的态度、立场、诠释和定位,正是这些思想让我们更清楚看到《四库全书》蕴含的思想遗产价值。无论是晚清民初的本土改良与革命,还是向西方孜孜以求真理,都是在这些思想遗产的“前见”基础上进行的。无形中,这些“思想遗产”作为一种潜意识,影响了晚清政府的改革模式、对西洋人的认知模式,以及民初的思想界走向。由此来看,“四库”系列藏书不仅典藏着过去,具体表现为蕴含着传统价值观、世界观及认知模式;而且孕育着未来,一方面表现为四库藏书研究的世界性意义,另一方面也建构着我们如何重估思想遗产、协调好本土文明与他者文明关系、平衡好传统与现代,以此走向未来。

二、目录学视角:以中化西的尝试及其未来走向

从目录学角度而言,“四库”藏书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典型、值得深思的“以中化西”范本。我们知道,第一,就传统分类而言,“四库分类”是对传统“四部”分类的自觉继承;第二,就近现代学科实际演进而言,“四部”分类逐渐瓦解而走向了“七科之学”;^⑤第三,就中西知识谱系而言,将传统知识门类纳入“七科之学”,多有“方枘圆凿”之嫌疑;尤其是以西方知识框架来“格式化”传统知识门类的做法,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疑虑和自觉反思。在此问题意识下,“四库馆藏”系列最初面临西学文献时,那种“以中化西”的目录学尝试便特别值得留意。在面对数量庞大、涉及不同学科的西学文献时,四库馆臣分门别类将它们编入“四部”,这是很值得留意的现象。我们想追问的是,为何此种“以中化西”的模式没有延续下来?在知识谱系上,将“七科”纳入“四部”分类的合理性何在?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思想创新及中西融会有何启示?

需要留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总目》“谱录类·叙”里,我们看到当时编纂者意识到分类上的困

① 张永超《“易学两栖”何以可能?——以“易学类”文献为例再论四库分类中的知识谱系问题》,载陈晓华主编《四库学》第5辑,第20—32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25《寰有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1页。

③ 张永超《明清之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及对西学观的影响:以耶稣会士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为例》,载黄裕生主编《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7年夏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7—368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1,第48页。

⑤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中国近代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难“刘向《七略》, 门类孔多, 后并为四部……六朝以后, 作者渐出新裁……附赘悬疣, 往往牵强。”^①似乎从知识谱系角度去看, 原有的“四部”分类已不再具有足够的覆盖效力。因此, 在后来对西学有了较深度的引介和理解之后, 逐渐接受了新的学科门类、知识分类。然而, 由此引发的深层问题在于, 以西方的知识分类尤其是以其知识谱系反过来“框架”或“诠释”传统思想谱系, 也有着难以化解的困难。例如, 关于隶属于“四库”“子部·术数类”文献的“巫”的研究。李零在《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中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现象, 并且说明了个中缘由。他说“在西方的汉学研究中, ‘巫’之所以引人注目, 原因是它同中国宗教/科学的背景有关……他们习惯的看法是, 对任何文化来讲, 宗教统治都必不可少: 要么‘王’之上有祭司、僧侣, 要么‘王’本身就是祭司、僧侣, 早期文化更是一定如此。而甲骨文, 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 在他们看来, 又正好支持了这种想法。……过去甲骨文专家陈梦家曾提出‘商王为群巫之长’说, 这一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很受欢迎, 原因就在这里。”^②或许李零关于商代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是“王室占卜流水账”的说法有待商榷, 但是, 他提到, 近现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关口大量引进甚至比附西学知识框架, 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 李学勤先生也说“在中国学术史上, 对古代巫术的专门研究, 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的 30 年代前后。当时有一些学者就传世载籍中有关巫术的记述作了开拓性的辑集和研究。他们大都受到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③

问题在于, “《金枝》”中的巫术现象与殷商时期的“巫觋文化”并不相似, 这也是前面李零反对以西学模式解读先秦“巫文化”的原因之所在。关于“巫”文化, 杨向奎论及此时说“巫以后是史”^④陈来则认为“夏以前是巫觋时代, 商殷已是典型的祭祀时代, 周代是礼乐时代”, 并且认为“宗教的伦理化在西周初即已完成”。^⑤ 鉴于此, 如何诠释传统文化, 回到经典文本具有逻辑优先性。如何自觉借鉴现成的学科门类, 将传统思想纳入现有的知识谱系, 任重而道远。由此而言, 回到“四库全书库藏文本”的原典研读, 并尝试呈现其真实的思想世界,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史意义。在此基础上, 方可有进一步融会中西思想之尝试, 由此而文化传承并推进文化创新才是可能的。

三、文化学视角: 通过四库学研究推进文化创新

从文化学的视角而言, 首先, 我们当突破“四库学”研究的地域限制。约定俗成, 我们会认为《诗经》《尚书》《周易》等中华古经是“我们”的, 而《几何原本》《名理探》《天主实义》等文本则是“他们”的, 来自西洋外邦。这似乎是一种先天性的“内外有别”, 是一种心中固有的“夷夏之辨”。但是, 我们应区分思想内容、文本承载和起源地域。从起源地域而言, 后者确实是外地的; 从文本承载而言, 确实是外邦语言转述而来。但是, 从思想内容而言, 则是全人类共享的。尤其是对于思想智慧的可普性而言, 恰恰是超越地域、外邦、语言、种族、肤色而服务、共享于全人类的。因此, 我们常常因为文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 115, 第 981 页。

② 李零《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下), 载《中国方术续考》,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第 57—58 页。

③ 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增订本),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李学勤“序”。

④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362—363 页。原文为“诗与乐章之分, 诗是舞曲也是史诗。原来历史掌握在神巫手中, 他们于乐舞祭祀时, 以史诗作舞曲。巫以后是史, 所以太史公自叙上及重黎, 而孟子说‘诗亡而春秋作’也正好说明了这种演变。”杨先生的说法很值得留意, 他的观点明显是“由巫到史”的“巫史论”表述, 首版序言显示的时间是 1987 年 8 月 10 日, 可见他提出“巫史论”是很早的“由巫而史”论述。

⑤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 三联书店 1996 年版, 第 11.4 页。

本源起地及其呈现方式来评判而忽略了其思想旨归,这是买椟还珠的行为。例如,对于汉语本《名理探》而言,我们不可以因其原出版地就认为它是“别人的”,这里应区分出版地、物权所有及思想内容。最终我们对于《名理探》的研读是指向其思想内容而非其出版厂商或者物权所有人。对于“四库”经典《尚书》《诗经》也同样如此,其意义效力不限于古代中国,而具有世界性指向。

其次,“四库学”研究当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展开。对于不同文明体系中工具性层面的语言、文本,我们当以“平等他者”视之。无论其源自何种出版厂商、经由谁排版、以何种语言呈现、由谁编纂,从“思想内容”角度立论,它们都是我们共享的文本。由此而言,《名理探》是“我们的”,正如同《尚书》是“我们的”一样,都是我们需要自觉继承、虔诚研读的经典文本。自利玛窦等引进西学以来至于今天,自觉地在文本和语言层面区分“本有”和“外邦”在我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现代媒介不仅让当代人生活方式共享,同时也让不同的传统经典共处。因此,在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时候,不能仅限于某个地域、某一些文本,而应面临全球化语境下多种传统共存、不同经典文本共享的局面,唯此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人”,否则,只是浅层次的貌似、深层次的神离,因为传统共享、经典共享层面依然支离破碎。我们要慢慢学会与不同的“他者”共存,关键是要与他们秉承的不同传统和解,不同文明的经典文本如同《四库全书》一样,都是有待我们继承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这一维度应纳入“四库学”研究的必要考量。

再次,“四库学”研究当回到“保存我们”这“第一义”的前提上来。“四库学”研究应正面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危机”。鲁迅当年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①“保存我们,是第一义。”若认可这一前提,那么意味着,无论在传统中影响多么大、多么重要,“四库学”的经典文本都处于“第二位”,其思想旨归是为了“保存我们”这“第一义”,而非相反。进而言之,各个文明体系都是我们共享的思想资源,不同的文明思想体系、人类智慧都是我们之外的“他者”,自觉地选择、学习、理解、吸收,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虔诚地学习、自觉地继承《诗经》《尚书》《名理探》《圣经》等不同的人类文明精神遗产。由此而言,文化传承才是有生命的,而且通过对于原有“四库”经典的研究诠释、吐故纳新,以及对“他者”文明的融会吸收、相互丰富,不仅能够促进文化传承,而且这一历程本身就是文化创新。

近些年来,陈晓华教授在努力推进《四库全书》走向世界。她关于《四库全书》纳入“世界记忆遗产”的努力有目共睹。^②我们应当看到,作为思想遗产,“四库典藏”是人类公有的。某一经典文本的普及性越广,其生命力越强。因此,我们一方面当着力发挥《四库全书》蕴含的思想遗产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回应价值,同时通过“四库学”研究,使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四库全书》逐渐承担其人类智库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其他文明系统中的经典文本虚怀若谷、充满敬意,通过虔诚学习和相互丰富,共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第一义”。

(责任编辑:杨艳秋)

(责任校对:廉敏)

^①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② 陈晓华《论〈四库全书〉的世界记忆遗产价值》,《图书馆杂志》2017年第11期。另可参见于沛和陈晓华关于“世界记忆遗产”的讨论论文,载陈晓华主编《四库学》第1辑、第5辑。